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中国·第九辑/陈平原主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7.7
ISBN 978-7-301-12529-8

I. 现… II. 陈… III. 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6020 号

书 名: 现代中国·第九辑

著作责任者: 陈平原 主编

责任编辑: 艾 英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12529-1/G·2140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编辑部 62752022

印 刷 者: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 开本 20.25 印张 400 千字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;电子邮箱:fd@pup.pku.edu.cn

现代中国·第九辑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2014年 苑月

历史,记忆,与大学之道

——四则薪传者的故事

王德威

20世纪的中国忧患频仍,趋近世纪中期的两场战争——第二次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——尤其惨烈。因此而起的政治动荡、民族迁徙,以及文化传承的裂变,影响至今未尝或已。在这段风雨如晦的年代里,曾有太多知识分子经历生命和学问最艰难的考验。历史力量的摧折每使他们身不由己,而在置之死地后,他们也必须重新找寻安身立命的方法,并为他们的选择作出承担。日后海峡两岸大论述恒以意识形态挂帅,这些知识分子的经历往往隐而不彰。事实上他们的故事才更见证现代中国史的曲折层面,以及记忆、想象历史的复杂条件。

本文讨论四位知识分子在世纪中期的遭遇:何其芳(1912—1978)、冯至(1903—1983)、唐君毅(1917—1998)、林语堂(1893—1984)。何其芳与冯至抗战以前已经凭诗歌崭露头角。何最早见知于京派文人,忧郁耽美的风格尤其让他名噪一时。冯至曾被鲁迅许为“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”^①,1935年初远赴德国亲炙哲学大师亚斯贝斯(1888—1968)。但战争期间两人各自有了大转变。何其芳到延安参加革命,成为赤诚的红色诗人;冯至则加入西南联大,诗风和诗学展现存在主义式的风采。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,治学颇受梁漱溟、熊十力的影响。抗战期间唐辗转各地任教,国共分裂后流亡香港,与钱穆(1894—1990)等人兴办新亚书院,苦心孤诣,这才是他儒家抱负的又一开始。林语堂在1930年代已有“幽默大师”之誉,之后赴美更成为介绍中国文化的畅销作

① 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大系·小说二集·序》写道,“连后来是中国为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,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”。见赵家璧主编《中国小说大系》卷缘第源页,上海:良友图书公司,1935年。这里的名篇指的是冯至在1934年10月《浅草》上发表的小说。见周良沛《中国新诗库·冯至卷》的介绍,收入冯姚平编《冯志和他的世界》,第152页,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4年。

家。抗战期间林来回中美,持续关心国是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,他决心羁留海外,1950年应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首任校长。

这四位人物的生命或许没有太多交集,但回顾 20 世纪中期知识、文化版图的变迁,他们的指标意义立即凸显出来。何其芳追求共产革命理想,唐君毅戮力延续儒家道统,冯至沉思个人存在和超越的可能,林语堂则企图建立海外华人知识界的理想国。合而观之,他们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家国动乱时的重要选项:如群体还是个体,守成还是通变,本土还是离散,中学还是西学,思想还是行动。五四以来种种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辩证至此陡然解散开来,付诸繁复的再组合。每一种组合都显示历史现实的变化莫测,也同时显示这些知识分子企图理解历史、赋予意义的努力。

而这四位知识分子的故事之所以动人,也因为他们能在关键时刻以文字铭刻一己的心路历程。战时何其芳、冯至诗歌风格和题材的蜕变除了代表个人品味和信仰的转折,也成为再现时代精神(在文学领域)的重要史料。林语堂主要以英语写作,他担任南大校长的风风雨雨是海外华人教育史的一桩公案,唯由他的小说作品我们反而得以看出线索。唐君毅不以创作知名,但现代新儒家中他被公认为最具有诗人的气质^①,他以“花果飘零,灵根自植”一语道尽世变后的悲愿,早已成为华人离散论述最脍炙人口的警句。

更重要的是,这四位知识分子在世纪中期的所思所为必须置于特定的空间——他们投身的四所大学——相互观照,才格外发人深省。何其芳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系主任;冯至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兼北大部分系主任^②;唐君毅是香港新亚书院创办人之一并曾任教务长;林语堂则是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创校校长。这四所大学原是历史因缘际会的产物,却不仅成为他们托身的所在,更提供他们落实生命信念的场域。出入文字述作和文化薪传的志业间,这四人展现的史识和史观历历可见。然而时移事往,当他们所曾奉献的四所大学——以及由大学空间所规范化、知识化的历史资源——还有他们所曾信守的大学之道,改头换面、甚至完全消失时,他们怎样回顾那段历史,或历史怎样安排他们的位置,势必成为后之来者不断反思的议题。

① 如徐复观:《悼唐君毅先生》,见《唐君毅全集》卷 1,第 151 页,台北:学生书局,1985 年。

② 姚丹:《西南联大: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》,第 152 页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6 年。

一摇诗轶与史的辩证

1938年愿月底,何其芳和友人卞之琳、沙汀夫妇经过十八天跋涉抵达延安。^①初到革命圣地,他们立刻有了气象一新的感觉。在周扬(1908—1982)的安排下,他们很快见到毛泽东。“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?……也有一点点儿可写的。”伟人自问自答着。^②延安的战斗气息已经深深感动何其芳,何况又有来自最高领导的期许。这是电光石火的一刻。他自动请缨到前方体验生活,矢志抛弃旧我。1938月19日他写出了广为传诵的散文《我歌唱延安》:

摇摇自由的空气,宽大的空气,快活的空气。

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,呼吸着,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。^③

1938月19日何其芳加入中国共产党,两天以后就和沙汀等人赴晋北加入贺龙的队伍。这年何其芳二十六岁。

要了解何其芳的转变,就必须回顾他到达延安前的履历。何其芳出身四川万县一个小财主家族,少年时代腼腆忧郁,唯独热爱诗歌,十七岁到上海求学,并开始向《新月》等刊物投稿。1934年何其芳进入北大哲学系,但他对艾略特(1898—1972)的《荒原》和瓦雷里(1897—1965)等英法现代主义诗人显然更有兴趣,晚唐五代诗歌的秾丽纤美也吸引着他。与此同时他打入京派作家的圈子,深受林徽因、李健吾、沈从文等人的青睐。^④1934年何其芳和好友卞之琳、李广田联合出版诗集《汉园集》,收入大学时代创作 19首,无不透露诗人的浪漫情怀:

摇摇对于欢乐,我的心是盲人的目,
但它不是可爱的,如我的忧郁。^⑤

也同在这一年,何其芳将他的散文作品交由巴金出版,题名《画梦录》。这些散文悠游虚无和现实间,充满婉转神秘的气息。借着古典故事人物或现世的浮光掠影(《扇上的烟云》、《王子猷》),作者演绎浮生若梦的主题,层层堆叠,终止于空虚和

① 何其芳的延安之行,见贺仲明:《暗哑的夜莺:何其芳评传》,第190—191页,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9年;又见王培元:《延安鲁艺风云录》,第122—123页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9年。

② 何其芳:《毛泽东之歌》,见《何其芳全集》卷九第122—123页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9年。

③ 何其芳:《我歌唱延安》,见《何其芳全集》卷九第124页。

④ 贺仲明:《暗哑的夜莺:何其芳评传》,第190—191页。

⑤ 何其芳:《欢乐》,见《何其芳全集》卷九第125页。

感伤的喟叹,笔调的精致细腻则犹过于事。1937年 缘月《大公报》文艺奖揭晓,《画梦录》获得散文类首奖。^①

在京派前辈的支持下,何其芳很可以持续已有的成绩。但就在他呢喃画梦之际,现实的不公不义,尤其是 1937年故乡之行的见闻,已经困扰着他。等到抗战军兴,何其芳的转向也就不令人意外。何战前重要诗作的全编《预言》要到 1955年才出版,虽然经过删订,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曲折心事。从初期的浪漫孤单(《预言》、《欢乐》、《爱情》)到中期的古典颓废(《休洗红》、《古城》),再到后期的现实白描和自省(《云》),何其芳不断在寻求一种声音用以对应他和周遭世界的关系。

此一时期何其芳最好的作品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色,这不仅可见于他和英法象征主义以降名家的对话,也可见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活学活用。艾略特的《荒原》成为他描写北平“古城”的借镜;李商隐、温庭筠诗词的意象和修辞丰富了他的颓靡想象。^②他笔下 1937年代的北平阴森幽丽,时间凝练成一种回望历史的耽溺,一种无以自拔的轮回:

摇摇仿佛跋涉在荒野
循磷火的指引前进
最终是一个古代的墓矿
我折身归来
心里充满生的搏动
但走入我底屋子
四壁剥落
床上躺着我自己的尸首^③

存在就是创伤。诗人被投掷在鬼火荧荧的荒野里,寻寻觅觅,终将发现所谓有情的主体已经是具尸体,他的今生就是他的前世。

是在这样的视角下,何其芳在延安的表现才有了脱胎换骨的意义。1938年夏天他离开贺龙的部队回到延安,随即被延揽至鲁迅艺术学院任教。鲁艺创立于

① 1937年 缘月,在时任《大公报》编辑的萧乾建议下举行了一次文艺奖金竞赛,评审包括朱自清、朱光潜、巴金、靳以、李健吾、林徽因、沈从文等京派作家。《画梦录》特别受到林徽因的支持。次年 缘月得奖者揭晓,除何其芳获得散文类首奖外,曹禺的《日出》、芦焚的《谷》分别获得戏剧和小说类首奖。三人平分了一千元奖金。见贺仲明:《喑哑的夜莺:何其芳评传》,第 怨页。

② 有关何其芳和 1937年代北方现代主义——前线诗歌——的关系,见张洁宇的精辟研究:《荒原上的丁香》,第二、三章以及附录,员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8年。

③ 何其芳:《古代人的情感》,原发表于 1938年《北平晨报》副刊,见《何其芳全集》卷 远,第 源页。

1938年春天,是延安时期中共培养文艺人才的基地,也是制定“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”^①。鲁艺幕后的推手是周扬,在他的敦促下何其芳加入了文学系,不久又接任系主任。尽管声势不小,鲁艺的经营始终十分艰辛。当时延安气氛尚称宽松,有分量的文人从王实味到萧军,从艾青到丁玲,其实各有山头。作为文学系的带头人物,何其芳的压力可想而知。然而粗粝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反而让他文思泉涌。他利用夜晚不能成眠的时刻写下多首诗歌,这就是有名的《夜歌》。^②

写《预言》和写《夜歌》的何其芳俨然判若两人。素朴的现实主义修辞取代了那些精美颓废的象征,劳动和生活的喜悦一扫过去的耽美和忧郁。如果《预言》的影响来自瓦雷里和艾略特,《夜歌》则取法惠特曼(辛克辛惠特曼)和马雅可夫斯基(艾辛惠特曼)。^③何其芳颂赞“生活是多么广阔,生活是海洋,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”(《生活是多么的广阔》);他期望“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,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”(《夜歌》);“我还要证明我是一个忙碌的,一天开几次会的,热心的事务工作者,也同时是一个诗人”(《叫喊》)。^④

而诗风的转变也反映史观的转变。在引起诸多议论的《解释自己》里,何写道:“我把个人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对照起来,我的确是非常落后的。”

回顾自己的“前世”,他毫不迟疑地指出:

摇摇我犯的罪是弱小者容易犯的罪
我孤独
我怯懦^⑤

他于是想“脱掉我所有的衣服,露出我赤裸裸的身体”。以今日之我审视昨日之我,何其芳的忏悔是彻底的。但这样的冲动是否似曾相识?想想他1934年代的少作:

摇摇但走入我底屋子
四壁剥落
床上躺着我自己的尸首

① 罗麦(利瓦伊汉):《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》,引自王培元《延安鲁艺风云录》,第1页。有关延安鲁艺的建构与历史,见王培元:《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9年。何其芳加入鲁艺的经过,见《何其芳全集》卷1,第141—142页。

② 《夜歌》1938年出版,后因“夜歌”隐有消极意义,遭到批评,1940年代一度改名为《夜歌和白天的歌》。

③ 蓝棣之:《何其芳诗全编》前言,第1—2页,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1999年。

④ 何其芳:《生活是多么的广阔》,见《何其芳全集》卷1,第142页;《夜歌》,见《何其芳文集》卷1,第142页;《叫喊》,见《何其芳全集》卷1,第143页。

⑤ 何其芳:《解释自己》,见《何其芳全集》卷1,第144页。

年抗战胜利,鲁艺完成“历史任务”而解散时,何其芳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文化干部了。

1938年何其芳奔向延安的同时,在上海任教的冯至也踏上流亡之旅。他的目的地是昆明,要在近四个月后才抵达。冯至青年时期就崇拜杜甫,但在身历流离迁徙之苦后,他才了解千年以前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感慨,因有诗作:

摇摇携妻抱女流离日,始信少陵字字真。

未解诗中尽血泪,十年佯作太平人。^①

的确,抗战以前的十年间由北平赴德国求学,再回上海任教,冯至的生活不离学术,哪里能料到乱离的艰辛?

作为诗人,冯至在北大本科已经显露才华。他早期的作品幽静婉约,对生命的暗流每有不能自己的忧虑。1935年的《绿衣人》以邮差的意象写下死亡的威胁:

摇摇但是在这满目疮痍的时代,

他手里拿着多少人不幸的消息?

当他正在敲人家的门时,

谁又留神或想——

“这个人可怕的时候到了!”^②

人世熙熙攘攘,但疏离和寂寞总在每个角落窜藏。冯至早期最有名的《蛇》(1934)如是写着:

摇摇我的寂寞是一条蛇,

静静的没有言语。

你万一梦到它时,

千万啊,不要悚惧!^③

或许正怀着这难以言传的寂寞和悚惧,冯至努力找寻沟通的方式。他发现了德国

① 冯至:《冯至选集》,第103页,重庆:四川文艺出版社,1983年,引自周棉《冯至传》,第104页,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1986年。

② 这首诗写于1935年。冯至日后对诗内关键词句作了更改,最明显的是最后一行“这个人”改为“这家人”,见《冯至全集》卷1,第27页,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9年,引自张辉《冯至:未完成的自我》,第104页,北京: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,1999年。

③ 冯至:《蛇》,见《冯至全集》卷1,第26页。

诗人里尔克(1895-1925),深深为后者的生命情怀所倾倒。^①1935年冯至赴海德堡留学,不仅有系统地钻研里尔克,也扩及其他德语文学大师如歌德(1749-1832)等的作品。更重要的,他得以追随哲学家亚斯贝斯,对方兴未艾的存在主义哲学产生兴趣。

面对生命的寂寞和悚惧,1935年代的冯至开始发展出一套形而上的看法。他认为孤独是个人本然的处境,因应之道不是逃避,而是承担。呼应里尔克的观察,冯至承认“人到世上来,是艰难而孤单……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哗忘却生命的根蒂……谁若是要真实的生活,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,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,担当生活上种种的问题”^②。这里的“担当”不再是传统天降于斯人的重责大任,而是个体面对日常世界一草一木无分轩轻的接纳。亚斯贝斯所谓的“爱的相互交往”,里尔克所谓的物我同心、敞开“观看”,都是支持冯至思考的重要观念。^③而作为一个有担当的独立主体,“决断”与“割舍”成为必不可免的考验。克尔凯郭尔(1813-1855)“非此即彼”(Entweder-oder)的理论在此留下了明显印记。^④决断和割舍带来可怕的自由,却也同时引发主体的蜕变,而只有这样的蜕变才能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。歌德的“蜕变”说成为冯至的终极依归。^⑤

尽管冯至思考存在主义颇有斩获,整个1935年代里他并未将其付诸文学表现。他按兵不动,仿佛等待一个时间的契机。而这个契机竟然是抗日战争。如上所述,抗战带来现代中国民族的大迁徙,文化政治的大变动。当一切价值秩序松动,生存或死亡、大我或小我的难题浮上台面,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挑战。这使冯至将他的形上思考落实到历史境况中。但冯至关心的显然不只是民族战线或爱国主义的问题,他毋宁更想叩问:在历史被逼到纷然散裂的绝境后,人是否还有选择

- ① 冯至1935年初识里尔克的作品,1935年赴德后开始有系统地钻研里尔克,深为倾倒。里尔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战争期中。有关里尔克对冯至影响的研究极多,最近的讨论见韩牧、宰昌王晓珏,“冯至与里尔克:从《致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》到《存在主义》”,载《冯至研究》,第10卷,第1期,2015年1月,第1-10页。
- ② 冯至:《里尔克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译序》,见《冯至全集》,引自解志熙的讨论——《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:论冯至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》,见《冯至与他的世界》,第1辑,第1-10页。
- ③ 见解志熙的讨论;又见冯至、里尔克、克尔凯郭尔,《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》,载《冯至研究》,第10卷,第1期,2015年1月,第1-10页。
- ④ 解志熙:《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:论冯至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》,见《冯至与他的世界》,第1辑,第1-10页。
- ⑤ 冯至与歌德的蜕变关系,参见韩牧《冯至诗中的歌德思想》,见《冯至与他的世界》,第1辑,第1-10页。

存在、安顿自我的余地？

从 1956 年开始，冯至推出《十四行诗》。这些诗描写死生的无常、山川岁月的流变、历史的暴虐，写来却充满静定的姿态：

摇摇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，
虽是占有，又随时放弃，

仿佛鸟飞翔在空中，
它随时都管领天空，
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。^①

在时间的洪流中谁都无法规避“生命的暂住”，而必须提醒自己“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，割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，生了疑问：这是谁的身体”。^②何其芳的那句“床上躺着我自己的尸首”有了奇异的回声；自我的异化也是自我启悟的开始。另一方面，冯至强调物我有着情的交流和死生蜕变的积极意义：

摇摇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，
他们经过了一次交媾
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，

便结束他们美妙的一生。
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
狂风乍起，彗星的出现。^③

比较冯至早期如《北游及其它》中的诗行，像“明天，一切化为灰烬，明月也没有光影，阴沉，阴沉”，战争期中的他反而有了从容的气派。他呼吁交流和沟通的必要（“当你向我笑一笑，便像是对面岛上，骤然开了一扇楼窗”，《十四行诗》第 1 首），也憧憬从“宁静的启示里，得到正当的生死”（《十四行诗》第 14 首）。^④多年以前他以蛇作为寂寞的意象，现在他问：

摇摇蛇为什么脱去旧皮才能生长……
它道破一切生的意义，“死和变”。^⑤

① 冯至：《十四行诗》第 1 首，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1，第 1 页。

② 冯至：《十四行诗》第 14 首，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1，第 14 页。

③ 冯至：《十四行诗》第 1 首，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1，第 1 页。

④ 冯至：《十四行诗》第 1 首，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1，第 1 页；第 14 首，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1，第 14 页。

⑤ 冯至：《十四行诗》第 1 首，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1，第 1 页。

至此,在延安的何其芳和在昆明的冯至选择了极其不同的创作道路。何其芳响应民族大义,加入红色圣战改造自己,冯至则选择沉潜内省,强调“依自不依他”的独立承担。他们被历史偶然抛掷到既定的人生轨道外,各自琢磨“死和变”的道理。他们的历史际会因为诗文创作而被放大流传,甚至有了典范意味。我们的问题是:如果何其芳现象需要放在一个知识场域—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——中来解读,冯至抗战中置身的环境又能彰显什么样的意义?

冯至原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,抵达昆明后的次年(1945)由叶公超邀请加入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。联大八年是他事业的转折点:他的《十四行集》和中篇小说《伍子胥》在此时完成,歌德与杜甫研究也在此时展开。西南联大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一页传奇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分别南下,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,次年临大再迁往昆明,改制成为联大。^①这所大学原是战时权宜的建构,却因吸收各校流亡的精英学者和学生,成为人文荟萃的所在。战争对文明的破坏自不待言,但战争带来的迁徙流离也解放了此前教育和知识的界限,甚至意外滋生了论学的自由。联大在校委会常委主席梅贻琦(1891—1962)的领导下,提倡学术独立,精神自由,超越现实,不求近功。^②这样的信念在举国抗日声中毋宁是个异数。此时国民党政权自顾不暇,对联大的控制有心无力,自然也是原因。试看联大外文系的阵容,从新人文主义的吴宓到自由派的叶公超、国家主义的陈铨、现代主义的燕卜苏(辛克莱·刘易斯),还有学贯中西的钱锺书等,即可见其包容性。

冯至并不是西南联大最活跃的教授,他的诗文也未必完全代表联大精神。但冯至的成就和联大反而因此更显得息息相关。这并不只是说联大学风兼容并蓄,容许冯至经营自己的天地而已。在更积极的层面上,有鉴于冯至致力的存在主义式论述——决断,承担,蜕变——必须有可供“选择”的理念或行动为前提,联大教授种种(包括了左翼和右翼的)学说立场自然形成了宽广的平台。这与何其芳任

① 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,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: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: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》第一编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5年;北京大学编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》,昆明:云南教育出版社,1985年。另见姚丹:《西南联大: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》第一章。

② 梅贻琦 1931年即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。1934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。对日八年抗战期间,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,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(见姚丹:《西南联大: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》,第107页)。另见谢泳对西南联大的讨论:根据联大学生纪念册《联大八年》的统计,联大 158位教授中,78位留美,38位留欧陆,15位留英,18位留日,18位未留学。猿位常委,10位留美,15位未留学,猿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,15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 10位留欧陆,猿位留英外,皆为留美。这一统计说明联大强烈的西方教育色彩,特别是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,主要受到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,见《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》,第 107页,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1985年。

教、创作的鲁迅艺术学院大不相同。在一个口令、一个动作的军事环境里,何来学术争鸣?更不用提《十四行诗》那样出入历史与生存的形而上思辨。如果鲁艺(和其他延安的大学)的目标是锻炼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革命信徒,联大则培养有所不为的知识分子。两者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既有差异,隐含其下的历史想象也就壁垒分明。

这就让我们重新思考冯至的中篇《伍子胥》。这篇小说作于 1938 年,恰是抗战最胶着的时期。面临现实的晦暗不明,冯至却刻意回到历史找寻启示。他根据《史记》和《吴越春秋》的记载,重写楚人伍子胥如何因为父兄被楚王所杀,一路出奔到吴国谋求复仇的故事。然而和传统叙事相反,冯至版本没有触及伍子胥报仇雪恨的高潮,反而在他逃亡的路上作文章。小说从伍子胥逃离郢城开始,写他一次又一次的感悟经验:走投无路的困厄(“昭关”),楚狂人和申包胥的遭遇(“林泽”),浣纱女子的灵犀相通(“漂水”),都成为流亡者自我反省、作出抉择的机缘。子胥最后来到吴市,但奇迹没有出现。他寻找精于射道的陈音不遇,迎上来的专诸则毫无担当。不久吴市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、面貌黧黑的“畸人”,“双手捧着一个十六管变成的排箫,吹一段,止住了,止住了一些时,又重新吹起;这样从早晨吹到中午,从中午又吹到晚上”。^①

冯至显然有意藉《伍子胥》故事新编,但作为一则国族寓言,它可能要让读者失望。与其说冯至思考家国深仇,不如说他更要探问那念念报仇的主体在过程中如何蜕化自己的可能。伍子胥历经挫折来到吴市,他的使命仍然悬而未决,但他已经不是出发时的孤臣孽子,而是时间鸿蒙中的“畸人”。这使我们想到 1936 年冯至就有专文《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》介绍尼采、克尔凯郭尔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,称之为 19 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三个“畸人”。^②冯至的子胥(子虚!)一无所成,应是抗战文学中的一大异端,冯至却认为他“在停留中有坚持,在陨落中有克服”,已经为生命画了一个“美丽的弧”。^③回头看何其芳在延安的呐喊:“每一个中国人所看见的中国,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,都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:革命必然的要到来,而且必然的要胜利!”^④西南联大的冯至以吹箫的畸人来回应“时代的号召”,他所作的决断和选择不言自明。

① 冯至:《伍子胥》,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猿,第 194 页。吹箫人的意象出现在冯至第一首叙事诗《吹箫人》里:“剩给他们的是空虚,还有那空虚的惆怅——缕缕的箫的余音,引他们向着深山逃往。”这是冯至最初发表的版本。引自张辉:《冯至:未完成的自我》,第 194 页。由逃亡到承担,两相比较,可以看出冯至的转变。吹箫人的意象早在 1936 年就出现在冯至的《吹箫人的故事》中,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员,第 181—182 页。

② 见解志熙:《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——论冯至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》,第 194—195 页。

③ 冯至:《伍子胥》,见《冯至全集》卷 猿,第 194 页。

④ 何其芳:《解释自己》,第 194 页。

二 摇花果飘零以后

1949年,据保守估计,当时有近两百万的军民奔向海外,造成抗战后又一次民族大迁徙。对多数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而言,国家分裂的创痛不在话下,但他们更关心的还是文化存亡的问题。唐君毅和林语堂就是其中的两个例子。唐君毅专治儒学,抗战期间在多所大学任教;林语堂早在 1920 年代已经享有盛名,1935 年赴美后更以英语写作中国而成为畅销作家。新中国成立前夕唐君毅辗转南下,最后到达香港,林语堂则来往欧美,不再作归国之想。他们仍然继续从事本业,但家国巨变激起了他们的危机感,于是有了海外兴学的企图。

唐君毅是现代新儒学大家,早年师从梁漱溟、熊十力、方东美、汤用彤,到了 1930 年代声名鹊起。他所致力的心性之学虽是陆王一脉,但强调“江右王学”与程朱理学的贯通,特重归寂通感、主静凝照的功夫。^①唐尝谓:“对此心之能自觉之一义,吾于十五岁时即见及,终身未尝改。”^②如何培养本心自觉的意识,使之充塞生命宇宙,以达明心见性、内圣外王的境界,则有赖毕生的修持。在 1955 年的《道德自我之建立》自序中,唐就期许“超越现实自我,于当下一念中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,以建立道德自我之中心观念”^③。当时儒学学者贺麟已经推崇唐是一代唯心论的佼佼者。^④而唯心论是不能见容于唯物社会主义的。唐在 1949 年出奔海外因此是不得不然的决定。

流亡却提供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机缘,锻炼唐君毅“超越现实自我,建立道德自我”的信念。1949 年 5 月,唐君毅与钱穆、张丕介、赵冰等人在香港创立亚洲文商学院,次年改制为新亚书院。新亚的建立首推钱穆的领军之功,但没有唐君毅等人的全力支持,不可能有日后的局面。这群读书人在大陆原来并没有办学的经验,一旦落脚香港,却激起了传承香火的心志。他们所要传承的是儒家仁义的道统,是宋

① 贺麟:《唐君毅先生早期的哲学思想》,见《唐君毅全集》卷 1,第 194—195 页。

② 唐君毅: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:生命存在之三向与心灵九境》(台北:学生书局,1982 年)下卷,第 194 页。见黄克剑的讨论:《百年新儒林:当代儒学八大家论略》,第 150 页,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9 年。

③ 唐君毅:《道德自我之建立》,见《唐君毅全集》卷 1,第 194 页。

④ 贺麟:《唐君毅先生早期的哲学思想》,见《唐君毅全集》卷 1,第 194 页。

明以来民间书院的体制。^①

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,这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定。钱、唐等人必须应付的一方面是英式殖民地教育体系,一方面是新中国的马列知识领导权,更不论庞大的教务行政开销所需。1950年代的新亚先后得到台湾当局、英国殖民政权、美国雅礼协会的支持,维持极为不易^②,书院的体制也必须与大学体制不断磨合。1951年,新亚与崇基、联合书院一起并入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,原本标榜的儒家问道问学的精神势必作出妥协。

1950年代唐君毅在新亚负责系务,同时身兼总理全院教务责任。他依然著述不辍,除了儒学本业外,也大量涉及海外华人文化和政治形势。^③唐繁复的思想体系不是本文所能处理的议题,以下着重的是在现代新儒家中,他何以一再被誉为最有文学怀抱者。唐的同道徐复观曾称赞他“以诗人的情调”写出如《人生之体验》等著作,贺麟指出他的著作“富有诗意”^④,唐本人论学也似乎有自知之明:他在晚期中心之作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的自序建议读者如果“于此书感艰难……则宜先读吾前所写之书,尤宜读上所提及吾早年所写带文学性之诸文,以引发相应之心情”^⑤。而用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话来说,唐君毅论述的诗意特征来自“故国山川的悲情”^⑥。正是这种于历史不得已之处所发出的言志缘情的姿态,使我们得以将唐君毅和本文其他三位知识分子作家相提并论。

唐君毅的“悲情”来自两端:一为忧患意识,一为遗民情结,两者其实互为表里。1951年唐发表《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》,慷慨陈述华族文化的分崩离析和坚守

① 有关新亚书院建立的经过,见《新亚书院简史》,收入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金禧纪念活动特刊》附录,1982,香港:中文大学新亚书院,1982年。另见钱穆:《新亚书院创办简史》,收入《诚明古道照颜色:新亚书院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》,第猿-10页,香港:中文大学新亚书院,1982年。黄祖植:《桂林街的新亚书院》,香港:容膝斋,1982年。新亚标榜的宋明书院精神在1950年猿月的招生简章中已经可以得见,参见钱穆:《新亚遗泽》,第50页,北京:三联书店,1982年。有关中国古代书院的渊源、体制和流变,见樊克政:《中国书院史话》,台北:文津出版社,1982年。有关中国现代书院的发展,见陈平原:《大学之道: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》,收入《大学何为》,第猿-10页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2年。

② 见《新亚书院简史》。

③ 如一九五八年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复观、张君勱四人签署,在《民主评论》发表了一篇著名的《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》,表达了当代新儒家的共同理想及期望。

④ 贺麟:《唐君毅先生早期的哲学思想》,见《唐君毅全集》卷猿,第50页。

⑤ 唐君毅: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》,见《唐君毅全集》卷5,第50页。又见唐君毅:《人生之体验》导言:“写作时常常感触一种柔情志忘”,“是而不胜其同情恻隐,时而又不胜虔诚礼赞”,《唐君毅全集》卷5,第50页。唐君毅早年的骚赋体诗歌《人生略赋》,尤其可供参考,见《道德自我之建立》附录,《唐君毅全集》卷5,第50-51页。

⑥ 司马长风:《忆唐君毅先生》,见《唐君毅全集》卷猿,第50页。

道德价值的必要。三年后又发表《花果飘零和灵根自植》,期勉海外流亡人士自信自励、别开新局。这两篇文章对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“离散论述”有深远影响。让唐有感而发的自然是 1911 年中国政治的大变动,但唐的文章之所以动人,应不仅在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政权的倾覆哀悼而已。清末民初以来,他所信赖的儒家道统不早在新学狂飙下,陷入花果飘零的困境?现代新儒家在二三十年代的兴起,本身不就是一项灵根自植的努力?往前推去,当龚自珍一辈学者在 19 世纪中发出“衰世”之叹,以“忧患”一辞注历史,已经为现代中国感时忧国的“大叙事”(大叙事)预作说明。^① 时间再上溯两百年,当明室覆亡,又有多少逐客遗民曾陷入续绝存亡的难关?一家一姓的兴废固然可叹,文化传统的承袭与否才是真正惊心动魄的考验。唐所心仪的王夫之(1619—1692)正是这类明末遗民的典范。^② 王在岳麓、漳南书院的讲学活动必曾给他很大启发。

“花果飘零,灵根自植”的启示因此未必只是儒学进入现代的困局,而有了历史的纵深。唐君毅的忧患意识甚至可以看做是儒家内蕴的重要命题:大道沦丧的叹息早在孔孟学说里已经屡见不鲜。而我们记得孔子的先室为殷贵族之后,他从来不忘“丘也,殷人也”的遗民身份。^③ 孔子晚年退而修《诗》、《书》,尝言“大道之行也,与三代之英,丘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”^④。这样的述作姿态,已超越宗族朝代,而着眼于时间流逝的不得已和文化遗产的艰难抱负。

唐君毅的史观还有一层形而上的向度。以他的所学,心与史的辩证永远耐人寻味。在《道德自我之建立》中唐君毅曾有如下的看法:

摇摇从时间之流转,一切之必需消灭上,我肯定了从宇宙的眼光上看,宇宙根本是无情的。天心好生,同时即好杀。先是宇宙永远是一自杀其所生的过

① 见拙文“《花果飘零和灵根自植》的启示”,载《唐君毅文集》,台北:联经,1996 年,第 1 卷,第 1 页。另见拙文“《花果飘零和灵根自植》的启示”,载《唐君毅文集》,台北:联经,1996 年,第 1 卷,第 1 页。

② 王夫之虽为明末遗民,但他并未再留恋明室,也不为清室效忠,而致力于华夏文明的留存。王夫之也反对国朝正统的观念,代之以天下兴废的考虑:“有离有绝,固无统也,而又何正何不正也?以天下论者,必须天下之公,天下非一姓之私也。”王夫之:《读通鉴论》,卷末《叙论》。另一位遗民文人顾炎武亦持类似看法。对顾而言,亡国是指易姓改朝,而亡天下则是涉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与伦理纲纪的兴废。因此顾写道:“有亡国,有亡天下。亡国与亡天下奚辨?曰,易姓改号,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,而至于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,谓之亡天下。……是故知保天下,然后保其国。保其国者,其君与臣肉食者谋之。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,与有责焉耳矣。”顾炎武:《日知录》,卷 1《正始》。

③ 《礼记·檀弓》。

④ 《礼记·礼运》。

程。……永远在本质上令人感起各种可悲的宇宙。^①

即便现实宇宙是如此的虚幻而悲凉,具有仁德的主体必须要求不断增益自我和我我,以生生不息的道克服宇宙洪荒的无明。如是层层剥复,才能贯串心物,开出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这就是唐君毅追求的理想了。

选读唐五六十年代的作品,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宇宙历史的“悲情”有不能已于言者的体会。明白了他的悲情何所来,何所寄,他对新亚书院的奉献才有了深意。这所学校是海外新儒家抵抗时间摧折、实践自我的最后据点。成败与否尚在未定之天,为生民立心、为天地立命的“诚明”之心却是一点不打折扣。^②唐以哲学见长,但因为他的诗人气质,使他在文学文化的论述中为自己的立场作出最生动的表达。

唐的《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》作于 1956 年,正值新亚草创之初,被唐视为非常时期的托命之书。^③其中《中国文学精神》一章纵论中国文学的思想源头和形式特征,尤见其人性情。唐认为中国文学在表现虚实、处理人与历史关系上与西方文学的重个人、重现实的趣味极有不同。^④这些论点不脱新儒家想当然式的臆测。值得注意的是唐如何响应比较文学的老问题:中国何以无西方的悲剧?他认为西方悲剧“皆直接关涉个体人物或人格之悲剧”,而中国之悲剧意识“则为‘人间文化’之悲剧意识”。不论是《红楼梦》的“繁华若梦”还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,均非人物性格悲剧,而是“人间世界在无常宇宙中之地位之悲剧”^⑤。唐更认为《水浒传》表达了中国悲剧的最高境界,因为《水浒》人物“顶天立地,直上直下,固不知人间有所谓感慨,一绝无悲凉者也”。但正因他们生死患难,直下承担,最后全军覆灭所遗的荒漠之感才令人无从解脱。由“惊天动地”到“寂天寞地”,这样的绝对空虚才是“人间之至悲”。^⑥

唐君毅评《水浒》等文学作品时,那场惊天动地的国共裂变已然发生。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他的悲凉之情不言可喻。而这也正是新亚书院诸君子聚义兴学之际。当唐论《水浒》产生的元代,思想艺术“乃中国文化精神上不能通于政治,下

① 唐君毅:《道德自我之建立》,第 22 页。

② 新亚校训。

③ 因此唐氏有言,“本书之论述哲学与中国文化诸问题,虽不如其它之著作较为详尽,然自本书所含蕴之义理,并联及问题之丰富,而富启发价值,则此吾之他书皆不如此书。”唐君毅:《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·第十版自序》,见《唐君毅全集》卷 9,第 5 页。

④ 唐认为中国自然文学善于表现虚实一如、忘我忘神的特征,和西方文学歌颂英雄、白描社会现实的趣味极有不同。而中国文学处理婉转往复的人与历史的关系,显现社会人情的全景,尤其值得重视。见《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》第 5 章的讨论。

⑤ 唐君毅:《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》,第 22 页。

⑥ 同上书,第 22 页。

不能显为教化,而如梦如烟”时,抚今思昔,他似乎意有所指,而当他写道《水浒》好汉“只有现在,不思前,不想后,生死患难,一切直下承担”时,就更令人感到此中有人、此中有事了。^①

所有的惊天动地最后都必归为寂天寞地,宇宙的宿命无人能够逃遁。但唐还是努力在历史的流变中安顿他所信仰的天心本体。是以在《中国文学精神》一章结束前,唐的笔锋突然一转,另辟蹊径。他承认绝对的孤独和空虚是生命的至悲:

摇摇然上下古今皆在吾人感念中,即又为绝对只充实。夫然而可在反虚入实,由悲至壮,即可转出更高之对人间之爱与人生责任感。^②

正所谓发乎情,止乎义^③,打通上下古今不只需要人同此心的不忍之情,也有赖薪火相传的责任承担。花果飘零不能不转出灵根自植,悲剧意识必须翻出“悲剧意识的超越”。这才是儒家史观的终极体现,也是新亚书院出现的最大动机。唐君毅治学和兴学的热诚至此托出,成为相互印证、互相照明的寄托。

林语堂出身传教士家庭,在上海圣约翰、美国哈佛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接受教育,早在 1916 年代的北京和上海已被视为西化学者的代表,1924 年代更因为提倡“幽默”,厕身《天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人间世》等杂志的编务,沾染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。1929 年林举家赴美,以后十年,他凭《吾国与吾民》(1935)、《生活的艺术》(1937)、《京华烟云》(1939)等书在英语世界大受欢迎,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。“两脚踏中西文化,一心评宇宙文章”^④,是他引以自豪的写照。他的见多识广、四海为家,充分展现一个世界公民的特征。

即使长居海外,林语堂对中国未曾忘情,抗战期间曾两度回国以明志。^⑤但 1949 年共产党建国却使他望乡止步了。抗战前他所标榜的自由主义和“幽默”写作,显然和左翼那套“血和泪的文学”大异其趣,抗战期间他和国民党势力的来往也为他留下纪录。1950 年代初林语堂寄寓美国,仍以写作维生,但他遇到两重难关,他潜心多年发明的中文打字机出师不利,让他倾家荡产;同时他和多年好友兼

① 唐君毅:《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》,第 142 页。

② 同上书,第 142 页。

③ 值得注意的是唐君毅的《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》分别以“发乎情”、“止乎义”、“感乎世运时事”作为三部分的主题。

④ 这当然是梁启超书赠林语堂的对联。见施建伟:《林语堂传》,第 142 页,台北:业强出版社,1990 年。

⑤ 林回中国的时间分别是 1940 年、1943 年。